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张昊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与满足人民文化需要的多元发展的辩证统一,从文化领导主体和文化创造主体两个维度发展了文化主体论;提出了文化主体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指明以“文化自信”为文化创造的精神力量,以“两个结合”为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丰富了文化使命论;强调建构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使社会主义文化更好地履行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教化育人的功能,实现由“他塑”到“自塑”的转向,深化了文化功能论。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主体论;文化使命论;文化功能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6-0005-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2024JZDZ014)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如何建设这样的文化等时代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观点、新论断,在“形于中”和“发于外”两个层面强调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1](P199),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这一思想提出以来,学界从多个维度对其原创性贡献展开了丰富且深入的研究,有学者从文化本质观、领导观、遗产观和交往观等方面进行概括,也有学者从文化功能、使命、原则等维度展开研究,总体上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鉴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本文无意也无力涵盖其所有原创性贡献,故而旨在聚焦于最具基础性的三个维度:文化主体论、文化使命论、文化功能论,为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以期为后续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选择这三个维度的学理依据在于:其一,文化主体论解决“谁来领导文化建设”和“谁来创造文化”的根本问题,是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其二,文化使命论解决“为何创造文化”和“文化向何处去”的价值导向问题,是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其三,文化功能论解决“文化如何作用于社会”和“如何发挥文化效能”的实践问题,是文化价值的现实体现。三者之间形成“主体—使命—功能”的逻辑链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这三个维度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力、批判力及解释力,明确了文化主体的新使命,强调了文化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推动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发展文化主体论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文化主体是人,文化具有实践性、民族性、社会性和

时代性的特征。在对“文化”的定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虽然并未直接明确提及或界定“文化”的概念,但是二人从文化的启蒙功用出发讨论了文化的价值,将文化确认为知识水平、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迈向自由与革命的力量。在对“意识形态”的阐发上,“意识形态”在两种概念上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其一是资本主义虚假的意识形态,其二是社会整体观念,即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很多研究者从第一种概念的使用出发判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将意识形态与科学进行分野,却忽略了社会整体观念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及理论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并阐发。面对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危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理论渊源,突出文化的重要作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联系,从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地位。其中,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概念,指出实践哲学的任务在于培养自身阶级的知识分子以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以此实现对民众的启蒙,这也是对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路径的明确。在此意义上,对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夺取被指明为并非只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单一力量作用,而必须是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知识分子与各种文化力量的合力作用。然而,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与经济基础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具有长期性,与政权的夺取在时间上并非同一。葛兰西指出,国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共同组成,提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两个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阶段:对政治社会而言,无产阶级需要先以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改变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运动战;对市民社会而言,无产阶级需要在获得政治领导权后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进行阵地战,不断获得民众认可,完成文化启蒙及文化领导权的合法性确证。

在“文化领导权”概念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何夺取文化领导权只是作为理论问题被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而在实践中无产阶级越来越难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完成这一任务。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不再关注阶级斗争问题,此时的工业文化已经颠覆了大众文化的原有面貌,统治了文化领域。因此,研究者关注的中心不再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经济决定论的误解,而转向对工业文化的批判。可以说,此时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把控到达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无产阶级失去了在西方开展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战的可能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凝聚难度愈来愈大。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看来,文化主体是社会中现实的人,是每个个体的人,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分野中的群体的人,民族国家中群体的人与作为类的人,其中,政党是文化的领导主体,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主体。政党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对民族国家的发展、统治阶级地位巩固的重要意义是被充分肯定的,但在实践中,政党究竟如何夺取并不断巩固文化领导权并激发文化创造主体推进文化进步却并未被验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文化领导主体和文化创造主体两个维度丰富了文化主体论,一方面强调作为文化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人民委托的管理话语的权力,即“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2](P314),另一方面坚持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民,强调“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3](P80)。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以此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同时,重视对中国人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的满足,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社会文化样态多元发展相统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意识形态的普遍规律出发,指出一元指导思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3](P12)。习近平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中都存在着多样的价值观念和取向,但其中必须有一种是形成全社会广泛认同的主流价值取向和核心价值观念,这套价值观念与这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是相适应的^[4](P98)。也就是说,某一种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位居指导地位,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性,而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无一例外,即便是高举“自由”大旗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也是一元的,绝不可能是多元指导。即使资本

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断更换,但是他们设计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仍然以一元的意识形态即其核心价值理念为统摄。爱德华·W·萨义德曾经将国家定义为“叙事”,其中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坚持叙自身之事,二是防止他人叙自身事^[5](P3)。换句话说,叙事是国家的内在规定之一,关键是叙的是什么事,以何种意识形态为指导去进行这种叙事。这种指导叙事的意识形态一定是一元的,也必须是一元的。

虽然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一元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已作出了诸多说明及阐释,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为贯彻一元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国家治理实践,为这种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和巩固提供了现实参考。马克思分析了统治阶级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内在一致性,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P550),这种思想是使这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6](P551)。而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因为这一阶级的观念与经济基础相匹配,在社会革命中,他们推翻旧统治阶级时,其特殊利益代表了更广大群众的普遍利益。因此,每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都比旧统治阶级依赖的基础更宽广,而与非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更加尖锐。任何一个国家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一定是一元的,并且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果没有这样一元的意识形态指导,国家和民族就难以前进。而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则必须使自己成为民族,才能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进而消灭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的假象^[6](P553)。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苏联便是由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而造成惨痛后果的现实案例。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决定要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再是科学的理论,甚至认为必须以“新思维”加以改革,将“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不阻碍苏联的发展^[7](P184)。这种改革从本质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更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生了矛盾”^[8](P204),这种所谓的“全人类利益”不过是通过去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强化资产阶级利益的抽象概念,其后果便是人民在价值观念上的无所适从和苏联的最终解体。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等论调,根本目的也在于扰乱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因此,习近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我们党才从根本上掌握了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掌握了创造历史的主动权”^[3](P13);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失去灵魂。正因如此,“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3](P14)。这项工作决定了文化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无论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方式如何变化,其任务是不变的,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P65)。

与此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作为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的人民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力量,强调文化建设要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3](P80),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将一元指导与多元发展辩证统一,既强调以满足人民的多元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坚持让文化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中国梦的实现服务。坚持“双百”方针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确的事物总是在与错误事物的斗争中才不断彰显其正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并不会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被损害。但必须注意,促进文化形态百花齐放的基本前提为,绽放的是“花”,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花”,而非“毒草”,对渗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毒草”必须予以清除。与此同时,任何社会中的文化想要永葆活力和生命力,就必须保持文化样态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反映时代问题和人民呼声的文化样态一定是多层次的,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只有坚持“双百”方针,文化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要,才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涵养全民族奋斗昂扬的精神气质,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3](P84)。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新时代下文化既要一元指导也要多元发展的实践要求,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一系列“形于中”的新部署新论断,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的“七个着力”,概括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在“形于中”上习近平强调,文化创造主体必须在文化样态创新及创造上“使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4](P211),文化领导主体在坚持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养人民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推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是根据新时代国情、世情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新要求,对虽然带有陈旧的表现形式但内在仍然具有借鉴价值的文化形态加以改造,使其具有现代的表现形式以及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和要求的内涵;创新性发展则是指立足新时代的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与时俱进的补充、拓展和完善。只有文化的创造主体与领导主体合力推进文化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才能增强,先进思想文化才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

二、明确文化主体的新使命,丰富文化使命论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主体是文化使命的承担者,主体意识是文化主体自觉承担使命并创造文化、创新文化的精神动力。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曾对文化主体在文化领域的任务作出过说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明确了工人阶级创造自身新文化的任务和使命,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做剥离,从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普列汉诺夫将文化置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中,将意识形态作为中性概念。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体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但二者的区别在于,作为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其科学性使它在权贵之中不受待见是自然之事,而无产阶级的任务正是坚持这种不受贵族待见的思想体系^[9](P212)。列宁提出了“文化革命”的目的与任务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并且指明了对待资本主义文化应有的态度是批判地吸收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将其作为创造无产阶级自身文化的资源。

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中国人民、领导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提出了文化主体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的使命,即主体在主观上形成文化自信,并以文化自觉的主动精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化创造和文化进步,丰富了文化使命论。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这一新使命提出了“两个结合”的科学路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文化自信,强调解决主体承担文化使命的内在动力问题,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脉,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3](P47)。2014年,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强调必须避免精神失落,并将文化自信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称为“四个自信”。在2016年时习近平直接指出,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1](P13)。从语义上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是相对概念。从本质上看,文化自信是一种对自身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积极传播发展自身文化的正确心态,前提在于主体的文化自觉。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0](P197)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对自身文化的这种自知之明,这是对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的摆脱与克服。

一方面,文化自信要求人们摆脱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近代中国在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中接触西方文化,很容易产生对自身文化的自卑,并且这种文化自卑确实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文化的自知之明需要中国人民摆脱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重新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厚重底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进入一个思想启蒙阶段,也是艰难求存的阶段,被迫进入文化转型的时期,也是迫使当时的学者对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期。五四运动后,文化领域更为活跃,出现了三个对中华传统文化持有不同观点的派别,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中国特色,在认为中华文化十分重要的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自由主义信奉“西

化”，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引领，使中国加快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新儒家则认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中国必须坚持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以确保东方式的发展特色与道路。在三者相互缠绕斗争的过程中，西化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开启了彻头彻尾的反传统、西方化攻势，他们认为，不破不立，不彻底破除中华传统文化的桎梏就无法焕发出新文化。西化派的代表之一胡适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便是知足，由于这种知足导致中国近代“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1](P424)。虽然胡适认为全盘西化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仍然主张以此“取法乎上”，进而得到调和中西的效果。吴秩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塑造出的中国人的最大特点是安分守己和老实，但国民素质低下，道德水平也低下。更有甚者，陈序经断言，中国的紧要问题不是“是否应当西化”，而是“能否赶紧去做彻底和全盘西化”^[12](P194)。可见，在中国的文化转型期和历史低谷期，文化自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和人民的认知，客观评价中华传统文化并非易事。

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的基础上，强调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论证了中华民族理应具有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明确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指明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始终重视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具有“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P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并不是互不关联、相互独立的关系，而是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源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一脉相承、生生不息；而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的精神文化。正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3](P44)。

另一方面，文化自信要求人们摆脱如同曾经天朝大国迷梦般的文化自负。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1](P17)。历史昭示着，“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1](P211)，中华民族曾经的文明蒙尘便是因为故步自封、闭关锁国，文化一旦退出交流互鉴，便会逐渐腐朽落后。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带有对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的警惕心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只有自觉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滋养，才能坚定理想信念。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新时代下文化主体担负的使命，明确了“两个结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途径，从总体上为解决文化创造及文化进步的问题指明了方向，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而后不断明确这一使命，即“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13](P10)，进而实现“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4](P9)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4](P15)，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明确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4](P35)的文化建设主题；要明确“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合理的、可行的，并且是已经成为现实的，将持续发展下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融通的，是彼此契合的，而不是硬凑在一起的。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5](P278)这种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便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有所区别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中所完成了的具体的文化；而文化传统则是历史性地传承性地流淌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日用而不觉不断发挥作用的力量。中国之所以与西方国家不同，便在于这种从未中断的文化传统，而西方国家的

文明框架内却发生过传统与现代的“全盘的质变性的决裂”^[16](P2)。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正是因其与从未断裂过的具有连续性的中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融通性,这种融通性并不是碎片化的,而是根脉与魂脉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只有且必须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中介,马克思主义才能深入中国人的心坎,中国人民才能“在行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17](P397)。

可以看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对文化的创造主体和领导主体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提高主体创造文化和推动文化进步的文化自信,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路径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保持与时俱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底蕴滋养中华民族,促使中国人民以历史主动精神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自觉自主地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并丰富了文化使命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三、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深化文化功能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文化的各项功能,不仅在“形于中”上改造和锻造文化的创造与领导主体,还在“发于外”上重视文化的解释与教化功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除了作为价值观念、知识信息的储存符号和人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还能够培育和教化人,对具有相同文化观念的群体、民族来说,文化也具有凝聚人心的力量,这是文化的功能与价值。

具体而言,一方面,文化具有解释政治和经济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承担着回应其他文化挑战的任务。思想文化的开放与多元为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一定意义上也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竞争中的忧患意识。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之间呈现出共存、竞争与交流的复杂关系。资本主义文化强势进入中国社会时,是以后殖民时代开启和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思维被殖民”^[18](P104)为目的的。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曾指出,美国在建立一种以经济和政治为两大实现路径的文化帝国主义,前者攻占世界市场,便于输出其文化商品,后者改造大众意识,影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立文化霸权^[19]。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文化将道理解释清,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讲清楚并运用于对错误思想的反驳,不空喊口号,不庸俗化,才能帮助人民明辨是非,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

另一方面,文化具有教化功能,能够影响主体的实践活动。因此,宣传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做人的工作”^[4](P66)。对国内社会而言,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以正面宣传为主,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使主旋律和正能量得到弘扬,这样自然会减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蚀的力量。对国际社会而言,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而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是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1](P212),将道理与事实相结合,不仅依靠别人讲,也要积极地自己讲,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更多地走向国际社会,才能让中国声音被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和认同。

对于如何在实践中履行文化的上述功能,习近平文化思想探索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完备的实际,面向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还不匹配、发展优势并未充分转化为话语优势、在国际社会“挨骂”问题仍未解决的现实情况,将社会整体观念变革与体系构建相统一。整个社会的观念变革的客体既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国际社会。观念变革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项潜移默化的系统工程,这种变革离不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能够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解释力,“形成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3](P96)。“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新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又一次巨大转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近代西方知识输入以来，始终面临着重建问题，并且已经经历了两次以“重建”为目的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1949年开始从民国多种西方学术思潮涌入中国向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转型，第二次转型则是1978年开始从“以阶级论为纲”向以“以现代化为纲”的巨大转型。而此时使用的“现代化”术语仍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现代化^[20]。这两次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中国实际的理论解释问题，但并未跟上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步伐。郑永年认为，如今中国之所以面临失语和挨骂的情况，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套解释改革开放实践以来的中国现实的自主知识体系，而只是一直沿用西方的知识体系，在西方话语中解释中国现实。中国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就必须重塑知识体系这一文明的最高表达^[21]。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与实践成就早已超出了西方知识体系能够认识和解释的范畴，继续使用西方知识体系认识、解释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及成就，始终限于西方概念与原理的框架之内，必然会导致道理说不出、说不清、传不开的困境。尽管经过新时代以来的努力，在许多领域中，中国共产党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种无话可说、话语无力的局面，拥有了自己一定的话语权，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斗争与夺取话语权的斗争形势依然较为严峻，解决这一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时代问题，更是长远问题。

事实上，文化主体究竟如何构建一个自身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引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中一直备受重视的理论问题，只是并未在实践中有所推进。葛兰西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时曾指出，由于资产阶级长久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占据统治民众的绝对地位，工人阶级想要产生实现自身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是十分困难的，对此困境，他提出了这样的突破路径：无产阶级要想获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锻造来自工人阶级自身的知识分子，并通过这样的群体去取缔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变。他认为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对社会作用的方面不同，前者作用的方面是智力脑力，后者则是神经体力，这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促进民众“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是统治阶级的“管家”^[22](P425)。而知识分子之中又包括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两种，前者的职能是乡村赋予的，后者的职能是现代工业赋予，两种知识分子之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进行转化的。关于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完成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转变，由于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具备真正的统治地位和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因此，他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设想并没有在实践中成为现实。

在这一问题的现实解决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刺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无产阶级巩固社会文化领导权、促进整个社会的观念变革提供了实践方案。“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一次新的巨大转型，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开始“以现代化为纲”向“以中国化为纲”的转型，也由“他塑”向“自塑”转型，这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整体观念变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三大体系”的内在联系，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发展及建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明确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习近平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意味着，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内核。也有学者将二者的关系概括为“体用”关系，即知识体系是“体”，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用”，指出“体立则用明，无其体则无其用。无无用之体，无其用则体亦弗显”^[2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即“三大体系”，是凝结着中国解释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专业认识的有机结构。其中，知识体系本身展现为话语体系的形式，一切知识都是以话语为表现载体呈现出来的，知识体系必然以话语、文字去构建；学科体系侧重于优化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结构，改善和解决各学科设置不完善和知识碎片化、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发展不足等问题；而学术体系则侧重于解决已有知识体系解释力与批判力不足以以及学术观点的水平与实践发展不匹配的问题。如果说，过去中国只能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否定与批判来完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证明，那么，随着这一伟大事业的不断发展，这种合理性和科

学性实际上已经在实践中不断显化。作为一种与西方知识体系相区别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便是将这一事业已经显化的成就凝练成为知识成果,实现一种在理论上的自我确证。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观念变革的关键在于主体自主地从以西方知识解释中国问题转为以中国理论解释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并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特征与要素,指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路径。这种自主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即其中国特色的本质,这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中国对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方面规律的总结与凝练,是摆脱“言必称希腊”的西方知识中心论的关键所在。其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这是中国特性的体现,这要求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必须面向中国人民。只有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将理论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才能得到中国的理论。其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体现原创性与时代性,这要求其建构必须面向时代之问与中国之问。其原创性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实践活动的特殊性。习近平指出,“去思想化”“去主流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不可取,中国不能跟在资本主义国家身后亦步亦趋。目前来看,面对西方理论在学术领域、社会思想领域的入侵和渗透,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水平与综合国力并不相称^[14](P478)。因此,要面向中国与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及主张,让世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15](P214)。其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要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对应的慨念和范畴,只有使用专业性的术语才能建构系统的理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实际上是对以往西方话语的术语革命。如高清海先生以哲学为例所说,“哲学属于体系性的理论,它的思维逻辑必须体现为相应的慨念、范畴和原理并且还要构成系统,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掌握和运用”^[24]。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概念上的创新发现与提出尤为重要。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慨念”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慨念,主体对客体的建构并非单向阐释,慨念不仅是客观现实的表征,也为主体认识和改造情境提供“武器”,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历史沉淀于特定慨念并凭借慨念成为历史”^[25](P1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每一次慨念发现与提出都在表征中国现实,并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现实情境提供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理论的建构基础。只有“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系统提炼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论和新实践”^[3](P49),才能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将社会整体观念变革与体系构建相统一,才能发展壮大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主流文化。

综上所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在领导文化建设中的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在文化主体论、文化使命论与文化功能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与文化多元发展的辩证统一;并且强调以主动精神提升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实现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指明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与方法路径,使社会主义文化更好地履行解释政治和经济、教化育人的功能,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成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3]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
- [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5]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 [8]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9]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 [10] 费孝通.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 [11] 胡适文存:第4集.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 [12] 杨深.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5.
- [1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4]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6] 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 [17]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8] 郑永年.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 [19] James Petras.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Late 20th Centu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94, 29(32).
- [20] 王学典.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从“特色”到“自主”.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2).
- [21] 郑永年,杨丽君.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知识重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之一).文史哲,2019,(1).
- [22]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23] 高瑞泉.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是一项重要历史任务.光明日报,2020-07-31.
- [24] 高清海.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20年哲学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哲学研究,1998,(6).
- [25] 方维规.历史的概念向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To Marxist Theory of Culture

Zhang Ha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original and distinctive new concepts, viewpoints and assessments, constituting the cultural chapter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and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has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subjects of cultural creation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uphold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nd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It has proposed new missions for cultural subjects in New Era, specify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s the spiritual impetus for cultural creation and "adap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to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practical path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by enriching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ission. Moreover, it emphas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grounded in China's reality and aimed at addressing Chinese issues, enabling socialist culture and mainstream values to better fulfill the functions of developing Chinese culture, rallying public support and fostering a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thus deepening the theory of cultural func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theory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ory of cultural mission; theory of cultural function; Marxist theory of culture

■ 作者简介 张昊,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湖北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